

(上接第43版)1992年,窦唯离开“黑豹”组建“做梦”。“做梦”解散后,他赶紧将窦唯收入麾下,又连夜翻墙说服何勇,拉上张楚营销出“魔岩三杰”。

1992年冬,《唐朝》发行,每到一处发售,都是人山人海。最后销售纪录居然冲上了《人民日报》的榜单。

1993年,摇滚热继续升温。“黑豹”举行穿刺行动,演出引起风暴,经纪人郭四做了一幅地图,大有要把摇滚红旗插满全国之势。

媒体方面,也有松绑。

郭四去央视,和李咏讨论了一下窦唯的离开。《东方时空》里,居然播送了张楚的《姐姐》。

而前几年,中国第一DJ张有待是冒着风险播了何勇的《钟鼓楼》,专栏作者黄燎原看乐手们太穷,才坚持在《北京青年报》上为他们吹鼓呐喊。

一切仿佛真的开始不同。

同时,滚圈儿也在努力树立好形象。

“黑豹”和“1989”搞了场“临终关怀义演”捐了不少钱,“黑豹”李彤公开表示:

“我们不想制造麻烦和混乱,只想给国家和人民尽一点力。”

时至1994,《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一炮三响,“魔岩三杰”把摇滚商业化带到一个新台阶。

张培仁胃口很大,依然觉得不够。遇到王晓京时,他说要买下他手上乐队的版权,去做第二张《中国火》。

年轻时,有人给张培仁算过命,说他32岁之前必死无疑。

张培仁心说:「操,老子非要把这件事干到一个地方不可。」

那一年,靠着37张假证件,他们去了香港。

05.

1993年,“柏林中国文化节”,崔健等人就把摇滚带出了国门。但在后人的记忆中,它显然无法跟1994年末的香港红磡相提并论。

时至今日,关于红磡,留下太多传说。

何勇骂“四大天王”小丑,黄秋生满场飞奔,观众陷入癫狂。

今日听来,传说令人血涌。

而当年,一行人去到香港时,谁心里都没底。张培仁半路接到电话,说证件是假的。他问怎么是假的,工作人员说:“文化部批了吗?新闻发文了吗?没有你他妈哪儿来的证件?”

张培仁心说死就死吧,于是众人以“神州艺术团”的名义,进入香港。

何勇骂人,其实是在北京。去了香港,他又把话圆回来了。演出前一天,张楚和乐手去7-11买了酒,在海边畅饮,都觉得这是个的好地方。

那的确是灿烂的一夜。

笛子、吟唱、嘶吼,尽管窦唯唱错了歌词,张楚的吉他手走音,观众还是给足了面子,狂舞嚎叫。

《高级动物》的迷幻梦呓,《钟鼓楼》的民谣三弦,《上苍保佑吃饱饭的人民》似诗的叩问,“唐朝”华丽的高腔…香港人没想到大陆能有这种音乐,红磡变成狂欢的海洋。

如此盛会,经由张培仁一手妙笔包装,赋予“摇滚春天”的意义,很快就被推往神坛,被视为中国摇滚的高峰。

它的影响确实不小,没过几年,“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传到北京街头,引起一个叫张伟的孩子注意,使得“花儿”开花结果。

原本崇拜老五、只想做个安静吉他手的谢天笑,看到这场演出才决定唱歌,最终带着“冷血动物”成为新一代地下之王。

只可惜,张君意气抒文采,笙歌终要下楼台。

谁也没想到,红磡过后,内地摇滚急转而下,昨夜繁花,转瞬凋零。

1995年5月8日,邓丽君突发哮喘死亡。

2天后,央视新闻播送了这条令人悲伤的消息。

次日,“唐朝”贝斯手张炬遭遇车祸,不治身亡。

丁武永远记得,张炬推摩托车出门时,他还嘱咐张炬,让他路上小心点儿。

在《月梦》里,张炬写道:“玉魂散飘落,几多凄凉。”

死亡带给滚圈儿的远不止凄凉。

此后,丁武一颓就是几年,老五跟他理

念冲突,离开“唐朝”,乐队的创作力几乎陷入停滞。

紧接着,圈内其他人也仿佛着了魔一样,纷纷失语。

张楚突然就写不出歌了,“黑豹”的唱片再也没能大卖,窦唯不愿开口唱歌,何勇精神上逐渐出现问题,头部乐队不是解散就是失踪…

张培仁的“摇滚大梦”还没开始,他就不得不撤回台湾,将魔岩留给一个同事打理。

这些表面毫无联系的事,看似撞邪的命运,实际上都有因可循。

它们是中国摇滚这个原本发育期就营养不良的婴儿必将遭遇的恶症,只是各种问题长时间潜伏,差一个脆弱的引爆点,早晚要大病一场。

实际上,1990到1994年间,逐渐升温的中国摇滚,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完美可人、冰清玉洁。

直到人们回头看去,才能看到它在理想消亡、经济挂帅这一时代转型期所处的尴尬位置,才能看到它因自大、无知而给自身带来几多损毁,才能看到它所承载的愤怒在这片日渐繁盛的土地上显得多么不合时宜。

一切可以从1992年说起…

06.

首先是圈子内部出了毛病。

1992年,一些乐队去北戴河义演回京,遭遇大规模抓毒。

其中就包括窦唯的“做梦”。

时至1997,“指南针”的罗琦跳上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她去买毒品。司机很负责任地直接把她送到了公安局。

罗琦为戒毒付出了巨大代价。

多年后,她接受采访说,圈子里沾了这玩意儿,不是颓就是死。最后她提到了一个名字,张炬。

倒不是所有人都飞过,飞的人都爱拿它当找灵感的借口。

李彤说一哥们儿写不出词来就飞,醒来一看写的是:香蕉很大,香蕉皮更大。

早在摇滚冒头时,就有人在《人民音乐》上批判说:“摇滚和毒品、滥交、犯罪挂钩,应该予以抵制!”

圈内某些人的作派,的确为人落下话柄。

何勇曾带着两把斧子去大地唱片抢母带。“面孔”因为和台湾制作人方可行翻脸,在半路上劫下他,以非常粗暴的方式将他家洗劫一空。

大咖们的不良嗜好和每场演唱会的声势,都令上面态度游移。

摇滚乐要去现场,但几万人在生理亢奋中难免过激,往往乐手们又爱煽动。

一次“唐朝”向台下扔鼓槌,“黑豹”的歌直接被掐,演出提前结束。

“穿刺行动”时,观众乱砸酒瓶。后来上头就不让他们行动了。

张有待曾说:

“1996年前后,摇滚演出审批已经松了很多。但有些乐手实在管不住自己。搞新时代音乐回顾,在台上把钢琴给踩坏了。”

他说的是何勇。

踩坏钢琴都是小事,何勇唱《姑娘漂亮》时大叫“李素丽”,说了不该说的话。

演出怕的就是有人乱讲话,怕乐手们拉观众互动。

自始至终,上头对摇滚都保持警惕,一直都在观望。

坊间传闻:亚运会义演叫停后,崔健从未收到明确的禁演通知,但在北京的演出就是过不了审批。

赵明义说:“每次报审都垂头丧气,特别受排挤。”

高演命运多舛,自然关系到资本投入。

雄心勃勃的张培仁,号称为中国摇滚可以赔十年不赚钱,结果第五年,台湾滚石就将其召回。

摇滚所需的设备和录音条件十分苛刻,演出也不是放个伴奏带就能唱的。而在和初代乐手们合作时,又有乱花钱、难磨合以及互不信任等诸多问题。

很多乐手都是扒磁带长大的,真进录音棚,一个人节奏错了,全都要重来。

拍MV时,“唐朝”被当成特务,何勇为保持音色一天不吃饭,其实他对个口型就行了。张楚则是无法面对镜头,无法跟乐队有效沟通。

但花起钱来,有些人觉得有了公司,不用手软了。

有乐队包过一年的总统套房,有乐队拉

着亲戚朋友到王府井吃上万块钱的饭等制作人报销。

“面孔”那张《火的本能》发行后,就是因为钱的问题才动手。因为养着乐手,资本也自恋地产生了一种救人于水火的优越感。

方可行就说了:

“没有滚石,那些人不过是街上的二流子!”

当然资本也不傻,他们洞察到内地乐手们渴望稳定收入的心理,以较低的工资拴住他们,甚至用一些二手乐器换来长期版权。

这群60年代的社会主义无产者完全不懂商业游戏的规则,稀里糊涂签了合同。也难怪多年后窦仙儿说台湾人不是来扶持内地摇滚而是来占山为王的。

“那根本就是一场阴谋。”

原本就不乐观的市场,还要受到盗版的夹击。

1993年,盗版磁带《中国大摇滚》发行,滚圈儿联名上告,李彤大呼“救救我们!”。

《黑豹》刚在香港发行,内地就盗版泛滥。

后来直接有人给赵明义打电话说:“你录音时把带子悄悄带出来给我,我给你三十万。”

从政策到商业,从自身顽疾到盗版围攻,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一开始就靠死磕才起步的中国摇滚,到底难逃一劫。

如果说以上种种还不足以击沉初代摇滚这艘风浪中的小舟,那么另外两个字则成了压垮骆驼的致命稻草。

通常而言,我们把它叫做:时势。

07.

时势就是你挡不住。

老人南巡的第二年,乐评人金兆钧就说了: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浪漫主义,不是现实批判的摇滚精神。中国人刚开始挣钱,老百姓会在很长时期内先追求钱。人们不会过分地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

同一时期的张培仁却表示,五年之内,中国摇滚就能带来革新,对整个亚洲产生影响。

不过他说这话的前提是:只要它没夭折,持续发展。

可惜商业化才到第四年,就已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态势。

摇滚最火爆时,更多老百姓还是热爱靡靡之音。

“魔岩”去红磡之前,“校园民谣”席卷各大排行榜,广州出了一大批流行歌手,所谓“94新生代”集体爆发。类似《爱情鸟》《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种甜软之音更符合大众审美。

1994年看似是摇滚巅峰,实际上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1994年,高晓松、那英等人在上海吃饭,宣布内地流行乐坛成立。

杨钰莹、毛宁的歌出现在各大点播台中,李春波、谢东等人纷纷拿出代表作。

待民谣风过去,大紧又拉上师兄宋柯成立麦田音乐,很快就挖掘出朴师傅。

香港四大天王声势不减,王菲登上《时代周刊》,但这群人风头都不及第二年的任贤齐,他把《心太软》唱遍中国各个角落。

这首充斥着大白话的哀柔情歌奠定了那个时代的流行审美,以至于打着摇滚旗号1989年成立的“零点”最火的歌也叫《爱不爱我》。

紧接着,《还珠格格》逆袭爆炸,塑造出第一个全民偶像,影视资本蠢蠢欲动,内地娱乐产业从拓荒期步入青春发育。

同样是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内地电视市场开始改革,好莱坞大片在中国首次上映。

这些当时看起来细微的变化,为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内地娱乐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选秀、造星、网红、票房神话,将一个也不会少。

数十年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又一个红人随风而逝。

与此同时,初代摇滚可调节节败退,溃不成军。

“黑豹”换了无数主唱,后来又是搞影视又是开店,赔得一塌糊涂;何勇靠药物生存,搬离钟鼓楼,没了女朋友,养的狗也死了;窦唯沉迷于音乐实验,自称与摇滚没有关系;张楚沉寂八年,出现在《天天向上》时年轻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丁武去《我是歌手》帮唱老狼,华丽的高腔不复当年,面对质疑,他说声带做过手术,不能不降调了…

娱乐潮袭来时,老炮儿们都跟不上趟。

当初LV还找张楚站台呢,可《造飞机的工厂》越发远离主流娱乐审美,不会迎合。“超载”的高旗倒试过写上口的流行歌,写来写去,发现迷失了自我,只能放弃。

大张伟老师说:

“那时候我搞朋克,一帮小孩儿蹲台下看着我那眼神,就跟看一脏裤衩儿似的。他们都不是真喜欢,就是瞎起哄。”

看到滚圈儿还有人三十多岁了满大街晃悠,他就果断撤退了。“忙蜂”酒吧的老板跟他说自己摇滚时一个月两百块钱也能活。

大老师问:“我能活,我爸妈怎么办?”

被“90现代音乐会”迷得神魂颠倒的臧鸿飞不无哀伤地给大家指了指条明路:

搞了摇滚二十年,不如录综艺两天。

当初张培仁离开,发誓三年后回来,结果一去就是风霜雨雪。

再回来时,山河已巨变。后来,他不得不承认:

“直指人心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音,不管对与错,你认不认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挡的。”

那个方向,早已和当年的马克西姆无关。

红磡十年纪念,张培仁还曾给内地滚圈儿写信,表达歉意。其实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

电影《马路天使》里讲得好啊:

「大家都是一样的命苦,谁也谈不上原谅谁。」

时隔经年,一路见证初代摇滚成长的摄影师高原开影展时,窦家媛看着作品问她妈:“你现在还听那些歌吗?”高原说早不听了:

“我爱听相声,图一乐呵。”

你别说,中国摇滚协会副会长,还真是一说相声的。

08.

1988年的冬天,Landy张培仁和Bobby陈升产生一个想法。

八十年代即将逝去,他们想出一张专辑,创作一些歌,不用迎合当时的台湾市场,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只想在速变的时代里谈谈理想和渴望。

结果,这张名为《新乐园》的唱片只卖了三万张。

一年后,心怀狂想的张培仁跨海而过,折腾了几年,他得到的答案和《新乐园》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启发是发觉魔岩有一大堆乱账后,他跑去买了本《看懂报表的十二堂课》,开始学财务。

张培仁曾设想,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听华语音乐,透过音乐去了解我们,有一天,摇滚能用我们民族的美学,去影响更多年轻人。

他甚至建议崔健,不要把它叫摇滚,叫它“刀子歌”,这样就可以脱离西方语境,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

好多年了,他觉得最可惜的还是“唐朝”。这两个字所承载的气魄,大概也是张培仁的渴求。

如今,旧梦已如浪潮退去。新的海面涨起来。

第一、第二代摇滚人的饥饿、理想、挣扎、悲喜,都像古老的贝壳被淹没在水下。夜夜嚎叫的马克西姆,风流的人与事,他们的飞扬和努力,都已化作感叹唏嘘。

如今,教父去拍电影,亏了几百万;张楚找回内心,重编《光明大道》拿给创业纪录片《燃点》做宣传曲;不开口的窦唯,也在知乎给手游《魔域》做了宣传;拿着保温杯的赵明义,说他从来没有中年危机。

何勇现在不想再提四大天王:

“因为属于他们四个的时代,也都过去了。”

2018年9月,臧天朔去世的消息刷屏。很多人只知道《朋友》,却不知道他曾是当年“90现代音乐会”的发起人之一。

1986年,他写过一首歌。天津走穴时碰见崔教父,崔介绍黄小茂填词,取名《心的祈祷》。

后来,都大半夜了,高晓松一同学跑去“邦邦”敲他家房门,说你出来,我听见一首好听的歌,现在就要唱给你听。

大概十年后,北岛在散文《波兰来客》中写下那段著名的句子: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